

让新业态从业者不再“望社保兴叹”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递小哥等新业态从业者补齐社保短板。

以快递小哥、网约工、代驾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劳动者,已经成为公众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帮手,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中的重要成员。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2019年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约有7800万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

然而,新业态劳动者在给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其权益保护却越来越暴露出跟不上现实需求的问题。职业不稳定、超时工作、劳动关系不规范、社保关系建立难以及接续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一群体。中国工运研究所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及前瞻》的调研报告中提出,新业态劳动者普遍面临劳动关系难明、劳动者权益难保护、工会维权服务对象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客观上已经成为束缚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藩篱。

按照我国的现行劳动法律,认定劳动关系需要符合一些刚性标准。比如,需要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资由用人单位发放,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等。但在现实中,新业态从业者与用工平台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符合这些标准,大多只能被认定为劳务关系。

正因此,这一人群的社保权益遭遇困境。这表现在不少地方的社保经办机构都有类似的规定——非本市户籍、没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者,不能在当地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社保。同时,在社保“捆绑”缴存的模式下,新业态劳动者谋求单项缴存某一种社保也受到了政策限制,由此弱化了不少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想缴的受限制,能缴的不想缴,这一人群的社保权益似乎陷入了走不出去的怪圈。

让新业态劳动者不再“望社保兴叹”,一些委员建议,“新问题要有新的制度加以应对”。破解劳动关系认定难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解决了,后续社保权益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在短期内法律上难以整体突破的情况下,“分类规范新业态下的用工,研究新

业态下平台用工和传统劳动关系就业的区别,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权益,释放平台经济活力,容纳更大规模就业。”荣英委员的建议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思路。

基于同样的思路,一些代表委员也开出了不少“药方”。比如,“在平台工作的灵活就业群体可按所在省份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支持网约工线上缴纳社保,突破地域限制,不局限在户口所在地缴纳社保”“加强政策宣传,让新业态从业者了解社保的基本知识、参保途径和缴费方式,引导他们积极参保”等。

事实上,近年两会代表委员提出的相关议案提案和建议,有的已经有了具体成果,正在逐步推动问题的解决,比如,有些地方开始试行工伤保险单独缴存。

跨过妨碍新业态劳动者社保权益的“沟沟坎坎”,需要代表委员和各界汇集智慧,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方案和思路,尽快拿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让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现场·我在我思

方大丰

“打造湘江边旧书摊,既为城市留下靓丽文化风景,又帮助一批低收入群众就业增收。”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讲述了株洲市改造湘江边旧书摊的故事,认为城市管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科学治理促群众乐业增收。

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千里之外,株洲当地媒体的报道与代表的呼吁、建议“隔空对话”——“5月24日傍晚,太阳落山,微风渐凉,株洲湘江边的旧书摊也开始热闹起来。49岁的胡前飞准时骑着三轮车,来到湘江边。他将一本本年代不同、新旧各异的书本,熟练地摆好,开始了一天的营生……”

旧书摊,是不是很温情?是不是能勾起很多人关于旧时光的某些情怀?

世间温暖,如同顺夫走琐碎的谋生,会不经意地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书,温情常常在“不足道”处释放或消弭。

摆好摊的胡前飞从手机里读到政府工作报告——“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办法要能用尽用”。这让他很有感触,并想到自己的经历。

他是下岗职工,好书。下岗后收购旧书临街售卖,没有经营许可,也没有固定摊位,常常和城管“打游击”,收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直到2011年,几名爱书之人发起“湘江边的旧书摊”,他便将摊点迁移至江边。

在这条200米的街市上,几乎每个摊主都有着和胡前飞差不多的经历。据旧书摊管理人员介绍,“下岗职工、低收入群体,几乎是所有摊贩的标签”。

阳卫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株洲市几年前搬迁清水塘工业区,涉及十几万名职工和几百家企业,没有发生职工闹事。我也曾多次去株洲采访,深知这种“静悄悄”的城市转型背后,有各级党政和工会组织大量细致的工作,包括制定政策和营造各种环境,帮助职工转岗、再就业、自谋生计。湘江边上的旧书摊,正是其中的注脚之一。

小摊小贩的生计背后,既艰辛,也充满尊严。对这些人的生意,是一味驱赶、一关了之,还是鼓励发展、规范引导?株洲市选择了后者,并且由旧书摊专门规划、建设了遮阳雨棚,增加了木座椅,抬高了木栈道……

“夏能蔽日,冬能躲雨,夜里有灯,看书不暗”。小小决策,让数十个家庭的营生从此有了依靠。

今年的全国两会,有人统计,出现得最多的词是“人民”,同时,与个人权利息息相关的民法典草案也提交大会审议,人们期待这是“一部能激发全社会活力的民法典”,期待它的施行能够印证立法的初心——人民至上。

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少大事,但老百姓的权利没有一件是小事。把基本民生的底线兜牢,把群众关切的事情办好,才能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方方面面。从成都的地摊到株洲的旧书摊,让人不免一再遐思和感悟,既合人情,又有法度,人们生活的空间才会更充满温情。

建筑学者何志森曾用四年时间跟踪一个围墙下买盒饭的小哥,观察他如何“用一根晾衣杆就捅破了设计师的围墙”,并写成博士论文。他从此致力于教育学生理解:为什么要在设计中考虑小贩子这样的群体。

这也让我想到了新基建。新基建提供了各种应用场景:智慧医疗、智能交通……生活越来越便利,生存越来越多样化,“新基建”引领人们走向智慧生活,但官员心中,除了装满关于未来的蓝图,也要更多地装下百姓居家过日子的柴米油盐。

如何“刹”住青少年体质“开倒车”

张海英

5月25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程红在政协大会发言指出,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主要指标连续20多年下降,33%存在不同程度健康隐患,小眼镜、小胖墩、小糖人等情况突出。我国缺乏科学系统的健康教育体质监测和干预体系,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学生不足30%。(见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上述数据令人不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儿童青少年体质却“开倒车”,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学生锻炼的有关政策安排仍未落到实处。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是否达标关系重大。早在十几年前我国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但实际情况不乐观。《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有中小学生学习健康促进行动,包括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等指标,能否落实是巨大考验。

儿童青少年体质下降是一种警示。首先,有关部门、学校、家庭、社会等必须高度重视,虽说过去我们也重视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但重视程度恐怕仍然不够,否则不会“开倒车”。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制度。有代表委员提出增加体育成绩在考试和升学测试中的占比、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青少年体质问题纳入考核问责等。这些都是有效办法。过去不重视学生体育锻炼,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试和升学中体育成绩不受重视,体育课也因此常常被占用。

目前,我国多地已经把体育纳入中考。健康中国行动也提出,要将高中体育科目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或高考综合评价体系。当体育纳入中考、高考,就能发挥“指挥棒”作用。但有成绩在各地中考、高考总分数中的所占比例是否合理,能否享受主课待遇,还有待关注和探讨。

此外,各地从职能部门、社区到家庭,在青少年体育锻炼方面应该加大投入。比如部分学校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最大难点在于学校场地有限,学生活动起来像“下饺子”。

只有落实健康中国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建设性意见,不断完善,才有望“刹”住青少年体质“开倒车”的趋势,进而扭转方向。

旧书摊里的城市治理故事，读到满满温情

“饭圈文化”不能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陈广江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娱乐圈的一些不良风气引发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文化产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宋文新提到“饭圈文化”(粉丝圈文化),建议对娱乐圈的不良风气进行整顿,引导演艺明星成为“正能量偶像”,担负起引导未成年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表示,明星很容易被模仿,一定要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行。

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关注娱乐圈的不良风气,恐怕和不久前发生在多地校园的粉丝应援某男星事件有不少关系。当一些老师公然在课堂上追星,并把孩子当成应援道具,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变味、畸形的“饭圈文化”是多么可怕。

追星没有错,但任何“圈”都有边界,凡事都有底线。当追星逾越了边界,践踏了社会公认的底线,就会成为一种有害、“有毒”的存在,让网络空间变得乌烟瘴气。

“饭圈”背后有一条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流量“黑产”链条。去年底发布的《北京互联网法院“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失范问题研究报告》显示,一些青少年无底线的言论侵害明星合法权益,不只是个人行为,还是粉丝团体、明星团队、营销黑号等组织化行为,粉丝们往往被网络推手当枪使,一些团队为了引流故意炒作话题,在“饭圈”大量雇佣水军,让粉丝陷入无底线骂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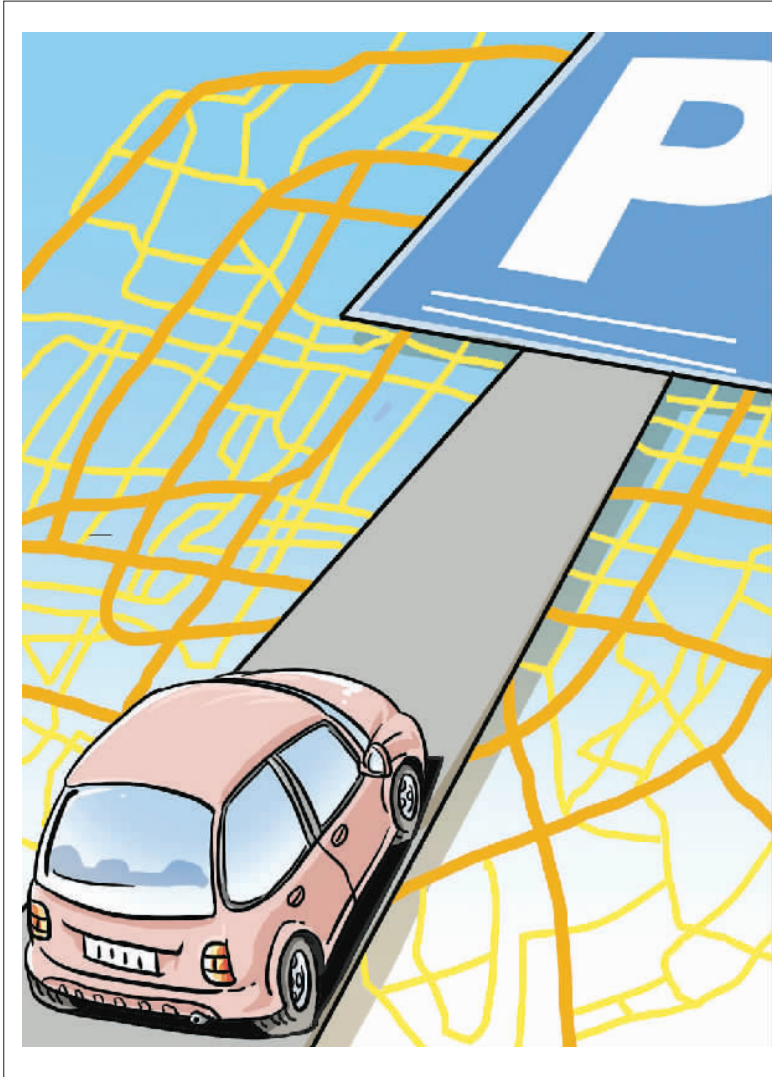
为了流量,毫无底线,这样的“饭圈文化”已经走向歧途。一系列无底线事件已经证明,只顾收割流量而不承担社会责任,最终会吞下“养蛊反噬”的苦果。在流量诱惑下,仅靠自律是不够的,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严厉整顿是必要的,而且宜早不宜迟。现实中,畸形的“饭圈文化”不仅污染了网络空间,扭曲了青少年的价值观,还带来了一些违法犯罪问题,是时候严加整顿了!

影响越大,责任越大,青年明星艺人更需爱惜自己的羽毛,让每一KB流量都洋溢正能量,都对得起粉丝的信任。

李英锋

“有个女孩子在工作中弄伤了手,刚住院那会儿老板还给垫付一部分医药费,后来不管了,她工伤赔付程序还没走完,家里也没钱,决定不治了……”全国人大代表侯艳梅在采访中提到这名女孩子反映的问题时,语气中充满惋惜——职工工伤治疗期的费用,谁能帮忙垫付?(见5月25日《工人日报》)

工作中受伤相关治疗费用的垫付问题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确实值得关注,也需要妥善解决。治疗涉及医药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在很多案例中,这些费用动辄达到数万元



G图说

智慧停车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日,山东青岛、山西晋城等地纷纷提出智能停车建设目标,要求统筹规划设置道路泊位,实施智能化改造,实现规范有序管理,力求老旧小区、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停车难进一步缓解。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48亿辆,但停车位供给缺口巨大。“停车难”成为不少有车一族最头疼的事。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车位不足的短板,不仅仅是增加车位数量那么简单,长远看,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解决车辆与车位信息不对称、提高车位利用率、实现车位统一调度管理等问题,是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有效解决“停车难”的关键举措。信息化时代,让数字交通更好地赋能城市交通决策、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处理好城市交通“久病而不愈”的问题,值得期待。

赵春青/图 弓长/文

劳动教育“从娃娃抓起”,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李松云

“让孩子们掌握生产劳动的一些方法或者技能”“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打通实践教学跟劳动教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立峰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李鸿彬两位代表同时提出“新时代如何加强劳动教育,让劳动教育重新回归”的话题,忧虑地指出,今天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对劳动的内涵并不清楚。

当下,有的孩子在家地位高人一等,以自我为中心;有的孩子要什么就能得什么,生活无比滋润……很多家长奉行“只要读好书就行”的理念,舍不得让孩子劳动,甚至有报道说一些孩子上初中军训时连鞋带都不会系。有人尖锐地指出,一些家长正在培养“啃老

族”,一些孩子永远长不大。

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劳动教育缺失是现代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去年11月,福建泉州的一对父母心血来潮,要以往从不做家务、读初二的儿子洗一次碗,儿子为抗拒和报复,竟然把厨房待洗的碗盘全部打碎。极端案例暴露出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就是明天社会的顶梁柱,如果只图养尊处优、排斥劳动,各种社会问题必将接踵而至。家庭教育不倡导劳动,学校教育不重视劳动,移动互联网生活某种程度上又弱化了“自己动手”——“网上什么都能买”“没有花钱买不来的服务”,似乎已成互联网一代的某种“常识”。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

垫付,但更多地方并未就费用垫付责任给出明确答案。

治疗费用有没有垫付机制,垫付责任清晰与否,直接关乎受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现实中,工伤认定往往程序较繁琐、周期较长,前期治疗费对很多家境一般或者经济条件困难的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工作中发生事故后,用人单位是否会积极帮职工垫付治疗,基本要凭良心,如果其积极主动垫付救治费用,受伤劳动者则可以获得较好的医疗救助,将伤亡损害降到最低;如果其推诿逃避,不愿意垫付,不完全垫付或者不及时垫付费用,那么劳动者大概率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正如新闻中提及的放弃治疗的女孩子一样。

工作中受伤,救治费用垫付应有明确答案

甚至几十万元。诚然,在工伤认定后,这些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或在用人单位未给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但如果没有明确的治疗费用垫付保障机制,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就存在模糊地带和薄弱环节,从而使得劳动者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甚至可能受到二次伤害,比如救治不及时或不到位,导致留下后遗症等。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这一规定比较原则笼统,不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垫付责任的法定依据。而各地制定的地方法规或实施上述条例的办法也不统一,比如安徽、河南等地就规定职工治疗事故伤害所需费用,先由用人单位